

王夫之《诗经》学研究

纳秀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夫之《诗经》学研究

纳秀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夫之《诗经》学研究/纳秀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61 - 7928 - 4

I. ①王… II. ①纳…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057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文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72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六经责我开生面

——纳秀艳《王夫之〈诗经〉学研究》序

夏传才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这是我一生最喜欢的一副对联，对联的作者是我敬佩的17世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国文化巨人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

船山先生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面临严酷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当满洲贵族的铁骑入关践踏中华大地，血与火燃遍大江南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堪受蹂躏和屠戮的汉族人民奋起反抗，曾经饱读诗书、通晓六艺的王夫之自觉地投入抗清义军参加战斗。各地自发的缺乏统一组织的抗战失败了，抗清志士王夫之誓不降清，流落于湘西少数民族区域。这是王夫之的前半生——一位坚持民族大义的明朝遗民，寄身瑶峒的流亡的知识分子。

明清易代是一段令人十分感慨的历史，满族总计200多万人，满洲贵族的八旗军队一共只有20万人，而且社会生产力和文化落后，以这一点国力和兵力，实际上不可能统治大于它本土几千倍面积的广阔国土，征服生产力和文化先进的一亿多人口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满洲贵族采取全盘汉化的政策，以铁血镇压与怀柔的手段，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和蒙古贵族，建立了巩固的全国统治政权，实行让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力的政策，获得实效。民族矛盾退居到次要的地位，有识之士乃总结明亡的历史经验，在于明王朝的统治黑暗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农民造反的烽烟四起，摧毁统治基础，国家积弱积贫，无力抵御外族入侵。在这种形势下，

2 王夫之《诗经》学研究

进行反清的武装斗争徒然无功，只会造成新的社会动乱而生灵涂炭。这些前明遗民，一方面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满洲贵族政权合作而隐逸民间；另一方面讲学和著述，传承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优良文化，关注于社会的进步改革。30 年前我写过一本书，称这些有识志士的代表是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三先生。

三先生生活的 17 世纪，已经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他们是当时中国的先进思想家。总的来说，他们继承古典的唯物主义，批判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开启了以实事求是、讲求实证为学风；以面对现实，经世致用为旨归，他们对社会政治改造的强烈要求，自思想文化上开辟了一个充满战斗精神的新时代。他们反对君主专制，宣传民族复兴，提出均田、减赋、工商皆本、司法公正等政治经济改良思想。他们对当时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新的社会经济因素有了一定的认识，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社会改革要求。三先生在明末清初社会大变革的意识形态领域鼎足而立，各有侧重。顾炎武主张实学，即社会政治改革之学，治学注重考据实证，奔波各地山川、民间，考察郡国利病；他创始浙西学派，是清代朴学的始祖。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把史学和经学结合，批判迂儒、伪儒、小儒，提倡治学关注天下治乱；他开创学术史研究，创始浙东学派，他的学说是后世托古改制的君主立宪派的先驱。王夫之则遍注群经，用疏释儒经的方法，宣传他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等社会改造思想，在文艺领域，他的诗学和美学思想与 16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理论基本一致。

在三先生中，我最推重的是王夫之。船山先生后半生隐居石船山麓，几十年足不踏城市，潜心著述。他为自己寄身草屋所撰的那副门联，完全表现了他执着的事业、思想信念中无私无畏、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上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为通行天下的儒家经书作不同于前人的别开生面的阐释，即重新解说，把这项工作当作改造社会的使命和复兴民族的责任。下联“七尺从天乞活埋”，我认为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直接从文句理解，紧承上联说如果我完不成这个责任，活着没有什么意义，把我活埋算了；另一层意思，即面对清贵族统治者封建文化专制的大兴文字狱，表示无畏的精神，完不成责任宁可活埋，怎么还会怕杀头、戮尸呢！这就是船山先生激情又理性的情怀。

船山先生著述丰富，但乾隆开四库馆，只取他的《诗经稗疏》及所附考异、韵辨，而且对原著中有关民族思想的内容有所篡改，船山先生所

有其他更多有价值的著述，一概列为禁书，不能面世流传。船山先生的《诗经》学只有三种著作，仅是他遍注群经以及众多诗文著作中的一小部分。他的著作为什么采取疏解六经的形式呢？这是因为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儒家思想学说法定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指导理论，是文化教育人人必读的读本，也是学术思想的主流。任何人生下来入学读书，必然要读儒经，必然就接受这些文化遗产，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是具有由他的前驱传给他，而他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思想家王夫之疏解群经而表达自己的思想，乃是历史的必然；他利用经学的外壳而赋予经典新的阐释。他的著作也就不能不带有经学思想和形式的一些痕迹和某些局限。

王夫之毕竟对六经作别开生面的解释，他吸收了儒学中最优良的核心成分，如人本思想、民本思想、保民富民学说、均平正义以及古典唯物主义，宣传民族复兴、社会经济改造的理想。在他生活的厉行封建文化专制的清初，这样先进的社会改革学说是不能流传的。虽然直到一百年后的乾隆中后期，部分著作得以面世，但他的《诗经》学著作中最有价值的《诗广传》以及其他著作，因为宣传复兴中华，反对封建专制，倡导均田和发展工商等政治经济改革思想，均列为禁书。清代后期，封建专制走向衰退，船山先生被禁的著作才得以刊刻传世，推进了维新运动思潮的勃兴。

船山先生的《诗经稗疏》所附录及《诗译》十六条，曾经受到经学保守派四库馆臣的批评性否定。《诗译》中，船山先生对孔子“兴观群怨”的诗论作出创造性的发展，也对诗歌鉴赏作出了新的解释。《诗译》与他的《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南窗漫记》合成《姜斋诗话》，其中所表现的诗学观、美学观与欧洲近代艺术创作理论和现代诗歌鉴赏的接受美学，有许多相似或接近之处。结合他的核心价值观，批判君主制的政治理想及其均田和重视工商的经济改革思想，使我想到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内容，二者何其相似乃尔！

14—16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一历史变革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宣扬人文主义为旗号，批判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对人的思想的束缚，为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在社会舆论上扫清道

4 王夫之《诗经》学研究

路。而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萌芽，手工业、木机工业和锻冶业的作坊、工场已经普遍出现，航海贸易处于世界领先规模。在思想上，以李贽（1527—1602）的“童心说”为代表，呼吁摆脱封建经学的思想箝制而争取个性解放。同时，逐渐扩大的市民阶层要求改变重农抑商和关闭海运的政策。但是，腐朽的明王朝以“非圣乱世”的罪名使李贽死于狱中。封建统治者建立在封建土地剥削基础上的小农自然经济轻视和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以致加速生产力的落后，民贫国弱，民乱蜂起。清王朝继续明王朝的这些政策，极力推崇封建文化思想统治，强化闭关锁国。王夫之批判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对人性的摧残；批判封建君主制度造成政治的腐败和黑暗。他为民族谋复兴，为生民请命。他要求均田重商，民富国强，以此责任心和使命感作为自己生命的情怀。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清王朝以封建文化专制制度压制这些进步的思想，禁止其传播。从16世纪的李贽到17世纪的王夫之，中国文艺复兴的火种被封建文化专制扑灭，原来文明先进的中国沦落为任由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迟了四百年，直到20世纪初期方才爆发，从此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审视船山先生的思想文化建树，更能显示出他的思想价值和人格魅力。

今《船山全书》存著作74种，380余卷，1000余万字，其中一部分于康熙年间初刊，道光以后清朝统治者力量日渐衰落，社会思潮有变，船山书逐渐偶有刊刻，至晚清同治四年，由曾国藩兄弟出资刊刻《船山遗书》57种，船山著作方得大行于世，震撼当时。在强国图存、社会政治改革的时代思潮中，船山思想学说备受推崇。民国初年，遗老们编纂《清史稿》时，对船山赞崇有加。

船山著作毕竟披着经学的外纱，故而在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横扫封建文化的运动中，对船山著作的重视和研究自然趋向稀少。但在30至40年代，他的诗论受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的重视并予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开始将船山哲学作为中国古典唯物论研究。这些研究都有可取之处，却难以摆脱那个时代阶级论和庸俗社会学的痕迹，如将王夫之学说定位为地主阶级改良派的思想理论之说。

20世纪80年代以后，船山研究进入崭新的时代。30多年来，国内对王夫之学术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着重于他的诗话中的诗学、美学、文艺、批评史论，共有十本专书和约一百多篇论文，其中王夫之《诗经》

学研究方面尚未有专著，至2000年，也只有十几篇论文。这些论文较多零散地研究训诂、叶韵、考辨及其艺术鉴赏和诗论。海外对王夫之学术的研究成果则很少。总的来看，对王夫之《诗经》学的研究，缺乏宏观的、系统的综合研究，对王夫之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研究，则更付之阙如了。

纳秀艳的《王夫之〈诗经〉学研究》，将研究对象置于明清鼎革的大时代背景上，从纵的（所继承的前代文化遗产及对后世的影响）、从横的（当世文化思潮与同时代文化著述的比较）两个方面，以文本为基础，对《稗疏》《广传》《诗译》的内容和方法论进行分析，作出科学的概括，再以更多的篇幅，分别研讨王夫之的诗学观、美学观，其中也重点吸收了几十年来现代学者有价值的论点而予以综合，通过自己的逻辑推理，作出总结性论述，尤其是在对《诗广传》的内容分析和专章探讨王夫之核心价值观的论证中，也讨论了王夫之的哲学、政治、社会、经济思想，以她会写诗的手笔，间接地描述了王夫之博学睿智、顶天立地的伟人形象。

纳秀艳是我的关门弟子。我在耄耋之年早已不收徒，却又收了一名学生，确实是比她年龄大得多的她的师兄、师姐们想不到的。我之所以收下这个学生，是被她好学勤思的精神所感动。她已经是在职教授、一个幸福家庭的主妇，要相夫教子，做一日三餐，仍然勤奋好学，求取学业上的深造；她是少数民族的知识女性，是她们省的优秀教师、省政协委员，还是九三学社中央思想研究中心的成员，可见她求学绝无个人功利目的，只是为知识精进而求学。她又喜欢写诗，我读了她的新体诗和旧体诗，发现她也颇有诗才。相距几千里她来投师，我应允指导她。

韩愈的《师说》说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指导纳秀艳这样的学生，不须我给她上课，只是以谈话的方式，予以引导、启发、答疑。记得第一次谈话，我只告诉她求学先学做人，治学是为经世致用，研究在于创新。然后指定她阅读的书，叫她写读书笔记，写出心得和疑问，每周一、三、五上午来我家，与我一同讨论。我就是这样指导博士的，是严了一点，但严格要求对学生有好处。读了些书，她决定以王夫之《诗经》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觉得这正是当前学术界研究比较薄弱的选题。

老师对自己的学生不能太多夸赞，我只能说她是很努力的，符合学术规范的，收集资料丰富，征引广博，逻辑思路清晰，综合推理得出自己的

6 王夫之《诗经》学研究

见解，对王夫之《诗经》学的认识有提高。

船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文化巨人，“六经责我开生面”，他不屑名利，隐身山麓，潜心著述，志在复兴中华，改革社会政治，造福生民，不惜“九尺从天乞活埋”，具有如此价值的生命情怀，即使他的著作在他死后约二百年才得以广传于世，他确是令人敬仰的文化巨人。纳秀艳在写博士论文时，打电话向我说：“在写作过程中，越写下去越敬重王夫之，他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我说：“好啊！王夫之也是诗人，写完这本论文，再用你写诗的笔，写一本全面评介王夫之的评传。”1962年，有人写过《王夫之传论》，距当代的学术水平差距已经大了，小艳，我们期待着一本新的评传！

2015年5月16日
石家庄思无邪斋

目 录

绪 论	(1)
一 研究缘起与概念界定	(1)
二 研究现状评述	(7)
三 选题意义及思路方法	(23)
第一章 王夫之《诗经》学产生的文化背景	(26)
第一节 历代《诗经》学的发展	(26)
一 《诗经》学的学术积淀	(26)
二 《诗经》学的时代要求	(35)
第二节 明清之际的时代特征	(39)
一 明末社会风气与思想动态	(39)
二 清初政治环境与学术思潮	(45)
第二章 王夫之《诗经》学的宗旨	(50)
第一节 “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实质	(51)
一 “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内涵	(51)
二 “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意义	(56)
第二节 “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渊源	(66)
一 文武名世的家学渊源	(67)
二 充满险阻的人生磨难	(71)
三 归去故园的生命诉求	(75)
第三节 王夫之《诗经》学的创新	(80)
一 抒情写志的“广传”	(80)
二 独具一格的“稗疏”	(87)

2 王夫之《诗经》学研究

三 别有性灵的“诗译”	(96)
第三章 王夫之《诗经》学的基本方法	(105)
第一节 不主常故的学术旨趣	(105)
一 超然世外的研究心态	(105)
二 独立自主的学术品格	(109)
第二节 融通文史的研究方法	(114)
一 出入文史 贯通古今	(114)
二 专题研究 以呈全貌	(117)
三 旁征博引 科学归纳	(125)
四 以诗解《诗》 探究诗意	(132)
第四章 王夫之《诗经》学的诗学观	(154)
第一节 诗际幽明	(155)
一 诗际幽明的哲学基础	(155)
二 诗际幽明的诗学内涵	(161)
三 诗象其心的诗学意义	(172)
第二节 “诗以道情”	(187)
一 “诗以道情”的提出	(188)
二 “诗以道情”的基本内涵	(194)
三 对传统诗学观的补充与修正	(212)
第五章 王夫之《诗经》学的美学思想	(223)
第一节 对“诗乐合一”的新阐释	(223)
一 “诗乐合一”被淡化的原因考察	(223)
二 “诗乐合一”的经典意义	(225)
三 声情合一的美学观	(231)
四 视域融合中对“诗乐合一”的阐释	(237)
第二节 对“兴观群怨”的再讨论	(245)
一 历代对“兴观群怨”的阐释	(246)
二 王夫之对“兴观群怨”的发展	(252)

第六章 王夫之《诗经》学的生命情怀	(273)
第一节 忧怀家国的情感指向	(273)
一 以孤心书家国之忧	(274)
二 以经典释遗民之恨	(280)
第二节 重视人格的精神取向	(287)
一 对圣人之德的仰慕	(287)
二 对君子人格的追求	(294)
第三节 重建秩序的美政理想	(307)
一 对君主制的批判	(308)
二 以民为本的君道	(310)
三 进退有度的臣道	(317)
结 语	(327)
参考文献	(330)
后 记	(337)

绪 论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古老的文化元典，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萌发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学，经由历代学者的发展与丰富，形成了绵延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史。以众多的学派、繁富的论著以及精深的思想，共同创造出一个学术奇迹。

王夫之《诗经》学，无疑是历代《诗经》学长河中卷起的一朵浪花。他不拘于传统经学和理学说《诗》的窠臼，以哲学家的智慧、文学家的心灵、美学家的眼光以及政治家的情怀审视《诗经》，探究《诗经》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学价值，赋予学术研究深沉的人文关怀。他的《诗经》学，在思想阐发和理论建构方面，不仅成就卓越，而且风姿特立，在《诗经》的思想研究和艺术研究方面，具有典范意义。

一 研究缘起与概念界定

（一）研究缘起

《诗经》首先是诗，诗性是其特质。林语堂先生说：“吾几将不信，中国人倘没有他们的诗——生活习惯的诗和文字的诗一样——还能生存迄于今日否？”^① 黑格尔说：“诗过去是，现在仍是，人类的最普遍、最博大的教师。”^② 的确，诗性与思想性，始终是诗歌的两大属性。然而，自汉代被尊奉为“经”始，《诗经》走上了经学化的道路，经学阐释视域下的《诗经》，最终黯淡了诗性的光芒，而被“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所包裹。

很难说古代《诗经》学的形成，与“经”的确立有必然关联。但是，

① 林语堂著：《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② [德]黑格尔著：《美学》第三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页。

“《诗经》‘经’之地位的确立，为后世对《诗》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优越的前景。”^①事实上，后世《诗经》研究的开发，是以失去《诗》性为代价的。换句话说，《诗经》“经”地位的确立，使《诗三百》成为《诗经》，而剥离了其“诗”的艺术性。郑振铎先生就此现象说：

《诗经》成了圣经，其地位益高，文人学士都不敢以文学作品看待它，于是《诗经》的文学上的真价与光焕，乃被传统的崇敬的观念所掩埋，而它的在文学上的影响便也渐渐的微弱了。^②

作为文学文本的《诗》与经学化的《诗经》，不但二者所归属的范畴不同，而且它们的性质亦有不同。追踪溯源，由《诗》演变为《诗经》，其滥觞于春秋时代。根据《国语·楚语》所记，当时就有“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③的诗教传统，至孔子教《诗》，倡导“思无邪”的思想，“经的体系进一步奠定”^④。李学勤先生将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六德》篇所记内容与《庄子·天运》“六经”之论相比较，指出竹简“所讲六经次第与《庄子》全同，证明战国中叶实有这种说法”^⑤。可见春秋战国时代为诗教观初步形成之时。至西汉武帝时代，随着儒术独尊地位的奠定，立五经博士之时，尊经思潮涌起，治经之风大兴。于是，《诗》则列入“经”，《诗经》的经学地位确立，在今文经派与古文经派的不断注解和言说中，经学意味愈演愈浓。后来，经过唐、宋、元、明、清等数代学界的不断发展，《诗经》研究日益繁荣，且各有千秋。回溯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史，实际上是以“诗”与“经”的争辩为核心话题而展开。在“经”与“诗”的交织中，推动《诗经》学的不断发展，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

诚然，经学研究无疑是古代《诗经》研究的主流，但不是全部。纵观《诗经》学史，不难发现，对《诗经》的思想研究和文学研究，始终是一股潜流与经学研究并行。孔子“兴观群怨”说的提出，在强调《诗

^① 邹其昌著：《朱熹诗经学诠释学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页。

^② 郑振铎著：《文学大纲》（上），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67页。

^③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8页。

^④ 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序》（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 同上。

经》社会功能的同时，也说明《诗经》具有的文学审美意义。孟子主张“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① 的说《诗》法，即是以《诗经》思想探索为旨趣。即使是在汉代经生的注解中，也掩不住对《诗》情的认同，《毛诗大序》所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郑笺》羽翼《毛传》对《诗》之深情者，亦有论及。如《葛生》郑笺云：“思者于昼夜之长时尤甚，故极之以尽情。”^③又如《采绿》郑笺云：“终朝采之而不满手，怨旷之深，忧思不专于事。”^④虽仅为只言片语，亦可窥经学语境难以抹杀《诗经》的文学特质。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著作呈现繁荣之势，从理论上对《诗经》的文学性予以肯定，钟嵘《诗品》第一次将诗歌含蓄委婉之风溯归为《诗经》，如评《古诗》云：“其体源出于《国风》”^⑤、评曹植诗歌云：“其源出于《国风》”^⑥。刘勰从修辞角度对《诗经》的语言艺术予以评价，他指出：“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为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嚙嚙学草虫之韵；皎日暭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⑦这股潮流至宋代，渐成气候，尤其是朱熹从感物道情的角度，提出“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⑧ 的诗学观，则是对《诗经》情感体认的进一步深化，他以“涵濡”体会《诗》之美感，为学诗之大旨。^⑨朱熹虽以理学说《诗》为务，但是他对揭橥《诗经》的艺术特质，亦颇有贡献。明代中后期，随着汉学和宋学的衰退，以文学说《诗》达到了高潮，出现了一大批以文学眼光评点《诗经》的著作^⑩，以期还原《诗经》的文学本色，确立其至高的文学地位，如胡应麟所言：“《诗》三百五篇，

^①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5页。

^②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毛诗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9—270页。

^③ 同上书，第366页。

^④ 同上书，第494页。

^⑤ （梁）钟嵘著，周振甫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页。

^⑥ 同上书，第37页。

^⑦ （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3页。

^⑧ （宋）朱熹集注：《诗集传·序》，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页。

^⑨ 同上书，第2页。

^⑩ （明）钟惺著：《诗归》、戴君恩著：《读风臆评》、万时华著：《诗经偶笺》等著作。

有一字不文者乎，有一字无法者乎……皆文义蔚然，为万世法。”^① 将《诗经》尊为万世文学之法，这无疑是对经学阐释的一大反驳。清代《诗经》研究以恢复汉学为宗，但文学说《诗》之潮流并未减弱。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学者，皆倡导以文学角度说《诗》，成绩显著。

综上，我们简要梳理了《诗经》学史的两大传统，意在说明古代《诗经》学的发展并非为经学研究的单线直行，其间交织着对《诗经》文学艺术的探讨和思想的阐发，二者共同构成了《诗经》学的全貌。这是我们审视历代《诗经》学的立场和视角，即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研究，而非用经学考察法一以贯之。

另外，学术界对历代《诗经》学的研究，多取学派或断代予以研究，这种纵向研究法，对探究《诗经》学历时性的学术特征，有其独到处，且成果颇丰。运用宏观的研究视角，的确能够揭示《诗经》学在某一阶段发展的群体性成果，却易于忽视《诗经》学个案的独特价值，甚至遮蔽其个性化的学术特征。

基于此，本书以王夫之《诗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对王夫之《诗经》学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做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探究，旨在挖掘王夫之《诗经》学独特的学术意义。

（二）关于《诗经》学概念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与《诗经》学相关的术语主要有“《诗》学”“诗经学”“《诗经》学”等。这三种不同的表达形式，其所指对象非常明确，即前者是关于《诗》（《诗经》）的研究，后二者只是表述的不同而已，内涵完全一致。而严格意义上的“《诗》学”，是指对《诗三百》的研究，换言之，就是对尚未尊“经”的《诗》的研究。陈战峰先生所说的“如果强调经学时期典籍理解和阐释的特点变化，后两个概念与前一个概念便有时限的不同”^②，即是此意。在实际的应用中，第一种表述并不常见，本文采用“《诗经》学”。

毋庸置疑，自《诗经》被尊为“经”始，经学研究贯穿着整个汉代

^① （明）胡应麟撰：《诗薮》，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页。

^② 陈战峰著：《宋代〈诗经〉学与理学——关于〈诗经〉学的思想学术史考察》，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至清末的学术史，无论对《诗经》的内容、思想研究，还是文字训诂、名物训释，都统摄于经学中，这是《诗经》学的主流。经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范畴，它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对此，陈战峰说：“狭义经学是指作为儒学理论形态或思潮的汉代经学，广义的经学则是指贯穿汉代至清末古代传统社会的儒学学术形态（包括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①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从广义而言，《诗经》学虽然与经学有关，但经学仅是其中一部分内容。所以，站在一个相对开阔的视野中，去审视《诗经》学的内涵，是必要的。

关于《诗经》学，胡朴安先生说：“诗经学者，关于《诗经》之本身，及历代治《诗经》者之派别，并据各家之著作，研究其分类，而成为一有统系之学也。”^② 胡先生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界定《诗经》学的内涵，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胡先生分别从学术标准、学术价值、学术方法三个方面，具体阐释《诗经》学的内涵。他首先对《诗经》学的学科特点做了较具体的界定，他说：“诗经学者，学也。学也者，以广博之征引，详慎之思审，明确之辨别，然后下的当之判断也。所以诗经学者，非《诗经》也。”^③ 胡先生进而指出：

诗经学者，关于《诗经》一切之学也。《诗经》本身，仅三百篇而止。《诗经》一切之学，即历代治《诗经》者之著作是也。《诗经》之本身，除文章学外，无他学术上之价值。《诗经》一切之学，授受异而派别立，派别立而思想歧。思想之影响于时代，社会道德之变迁，国家政治之因革，皆有关系焉。所以诗经学，一为研究治《诗经》时代之思想，一为研究《诗经》者各时代之思想，而并求思想变迁之际。^④

胡先生所言“《诗经》之本身，除文章学外，无他学术上之价值”。这是说明作为文学文本的《诗经》，其价值首先在于文学性，其他则次

^① 陈战峰著：《宋代〈诗经〉学与理学——关于〈诗经〉学的思想学术史考察》，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② 胡朴安著：《诗经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